

全球化时代后发大国经济成长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竞争优势

□罗 影 □汪毅霖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和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等后发国家的传统优势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因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本身具有局限性,更是因为按照“萨缪尔森的忧虑”中的逻辑,中国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升级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故后者有激励对前者采取遏制策略。所以,中国经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系于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活力。为此,中国需要有全面而完善的“竞争性产业政策”、适度而有效的“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反映二者间协调配合的“混合性产业政策”,从而方可避免“阿明的提醒”中的不利局面,顺利推进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

关键词:李嘉图—穆勒模型;中心—外围模型;产业政策;新型举国体制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3)05—0024—09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3.05.003

一、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大国经济成长的两种可能前景

全球化东风下中国经济的成长及其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这源于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的实力不断增强。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同年,中国按照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在2017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新兴大国,其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上述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人类近现代史中,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现代化,尤其是指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的现代化。所以,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仍然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发展机遇紧密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1]133}。而在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时,必须“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2]6}。作为一个新兴的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竞争优势的消长会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乃至全球经济格局造成何种影响,经济学家们做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预测。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耄耋之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化的重要论文。他使用李嘉图—穆勒的相对比较优势模型刻画了第一种可能前景,我们可称之为“萨缪尔森的忧虑”:在全球化的开放型经济下,无论是从得益于自由贸易的总收益来看,还是从国内的分配格局来看,美国都将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相对贫困的识别、比较和成因研究”(KJZD-K202200307);西南政法大学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校级科研项目“基于双重历史视角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研究”(2023XZZXYB-11)

作者简介:罗影,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汪毅霖,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因为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美国的传统优势领域)的技术进步而遭受损失^[3]。

作为与上述美国中心主义悲观论点的对照,著名的埃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纪之交,在自己的专著所做的“中文版序”中描述了第二种可能前景,我们可称之为“阿明的提醒”。其主要含义是指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的主要表现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一般,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4]37},或至少“被排斥于中心的大量工业品贸易之外”^{[4]38},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关键资源,“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形式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国如果进一步结合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5]8}。

虽然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皆不同,但是上述两种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所关注的焦点是一致的:基于零和博弈的视角,中国能否在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领域实现技术进步,从而引发中美之间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的大转型。以此为引子,本文所欲讨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使得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潜在生产率优势从假设转变为现实,即是否有可能继续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避免比较劣势和后发劣势,继而如何进一步将源于比较和后发的传统优势转型升级为新的竞争优势。这一转变对中国之命运异常重要,因为只有成功完成转变,中国才可以避免“阿明的提醒”中的不利于己的前景,进而最终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二、后发大国经济成长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概念、作用与局限

“比较优势”理论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视为一条金科玉律,萨缪尔森就称之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忽视比较优势的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会付出沉重的代价”^{[6]561}。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从初始要素禀赋的差异——劳动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说明了一国的比较优势的来源,将李嘉图—穆勒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内生化。

从经济思想的起源来看,李嘉图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穆勒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倡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7]111}。于是,基于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国家间的分工的“好处在于能使世界上的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8]119}。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包括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的后发大国)来说,无论其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比较优势都是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倚仗。从全球视野来看,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的扩展提高了全球的总体生产能力,而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后的国际贸易而使自己的情况相对于闭关锁国的封闭经济来说变得更好。

比较优势重要,但仅仅依靠比较优势并不是后发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因为“后发优势”才是后发国家的特有优势,其可以避免后发国家始终停留在低端商品的比较优势陷阱之中。后发优势的概念源自格申克龙对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后发大国的工业化道路的经济史回顾,其含义是指:“在落后国家存在一个‘恰恰’不为先进国家所控制的工业发展的‘前提’,这就是较先进国家的存在成为了技术支持、技能性劳动力与资本品的来源。此外,海外资本丰裕地区的存在还涉及原始积累的问题。就资本可以从国外输入而言,先前创造的国内财富的重要性被相应地削弱了”^{[9]55}。而工业化的技术和资金弱势的弥补在后发国家通常都依靠政府的组织来完成,且越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就越明显。

从促进经济成长的机制来看,比较优势可以在静态层面提升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后发优势则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了获得技术和资本的低成本途径。并且,两种优势动态关联: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取决于一国的天然禀赋(初级要素的初始价格和丰裕程度),所以是外生的,但是其在长期是内生的(“萨缪尔森的忧虑”正是以此为前提),且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是后发优势的发挥程度的函数。所以说,比较优势在长期到底会成为促进经济赶超的优势还是诱致分工固化的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速率和方向的技术进步,而至少在后发国家的发展初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途径是发挥后发优势。于是可以认为,虽然后发优势的有效发挥不能脱离本国的比较优势的实际状况,但相较于比较优势来说,后发优势对于后发国家的经济成长更具根本性。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以及进一步的产业升级至关重要,但是在推动后发国家的经济成长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二者仍然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过度依赖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局限在于其将导致一国的发展路径被锁定在低端制造业领域,进而很可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红利的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后发国家在近代的殖民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沦为能源、原材料和低端制成品的输出者和发达国家的高端制成品的倾销地。在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国家实现了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目标,但是其他地区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则步履艰难。甚至而言,很多亚非拉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偏误和国家治理的失败而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情况^[10],使得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倒退回殖民地时期的状态。

于是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后发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从属地位,但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却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后发国家所处的国际分工领域一般来说集中于低端产品(如食品和能源、简单加工品、低科技含量的制造业等),而生产此类产品的准入门槛较低,在全球化背景下必然会有后发国家之间的激烈市场竞争。供给的增加会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以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的高端产品与后发国家专业生产的低端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来衡量)。此时,虽然全球化会给后发国家创造更多的国际贸易机会,可能使得专业化生产和出售低端产品的后发国家的国际贸易总收益有所提高,但是利润率会由于激烈的开放型经济竞争而被压制在较低水平。

在全球化背景下,处于低端产业的国家不仅可能会遭受开放型经济竞争的诅咒而使得利润率维持在低水平,且它们在传统比较优势领域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反而令自身的收益下降。正如萨缪尔森所证明的:中国在向美国出口产品领域的技术进步竟然可能导致中国的贸易收益的降低,原因也是供给增加恶化了贸易条件,总收益因而下滑(全球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则这种可能性越大),随之发生所谓的“自我贫困化”^[11]。如果中国原本出口的是低端的产品(这符合中国出口的特征事实),那么在自身产量提高的同时还要面对其他后发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例如出口加工类商品的“中国制造”当前正在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的竞争)。一旦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则产能提高的结果将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导致“自我贫困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摆脱不利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前景取决于它们能否在原本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领域取得显著的技术进步,实现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的低端迈向高端。超越静态的比较优势即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要依靠技术进步,而凭借后发优势,以模仿和引进等方式向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学习是取得技术进步的低成本办法。可是问题在于,利用后发优势同样具有局限性,背后的原因是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驱动型经济成长可能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萨缪尔森的忧虑”背后的模型假设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贸易只在中美两国之间进行(这类似于大卫·李嘉图的经典的英国和葡萄牙的例子)。作为一种拓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在彼此之外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更大的市场,故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商品贸易并不见得发生在中美之间。然而,一旦中国在美国原本居于生产率相对优势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并且凭借这一进步而进入了该领域的国际市场,则由于全球总供给的增加,贸易条件对美国来说恶化了(世界市场上该种商品的价格

下降),美国的利益还是会受损^[11-12]。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优势产业的技术进步对美国来说激励不相容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从博弈的视角看,虽然萨缪尔森等对美国的全球化前景持悲观论者都不主张放弃自由贸易,但是他们所描述的不利于美国的可能前景的潜在的政策含义恰恰在于,美国应该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升级采取遏制策略。由于通过技术进步进而以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占优策略,那么按照“萨缪尔森的忧虑”,美国的唯一博弈策略选择只能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之于美国的相对技术进步(或者降低中国的进步速度,或者提高自身的进步速度)。除了纯粹的经济原因,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还部分来自中国的特殊性即来自经济之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中国不仅是一个后发经济体,从经济体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来看更是一个新兴大国。新兴大国的开放型经济成长的影响不同于小国发生类似改变时的状态,其会对整个世界市场的贸易条件和全球化的分工体系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现代化有其在国际环境上的特殊性:以“萨缪尔森的忧虑”为经济基础的“修昔底德陷阱”^[13]。

阿明提出的五个维度,即“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讯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4]的垄断正是美国与中国开展博弈时可以倚仗的资源优势。经典的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发达国家的垄断对后发国家的赶超的负面影响,而阿明的拓展在于从“五个维度”对影响机制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概况。从“五个维度”来看,萨缪尔森命题与阿明命题是互补的:萨缪尔森说明了在中国迈入高端工业化阶段并开始进入美国原本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之后,美国对中国采用对抗性博弈策略的经济动机;阿明则说明了美国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可以凭借的条件及期待实现的结果——充分利用五个维度上的垄断以阻碍中国跃升到全球分工的价值链高端。

美国自二战以来在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是需要客观承认的。利用这些优势,美国在二战后曾经阻止过德国和日本威胁自己的经济地位,而美国对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干预也是公认的事实。所以,“阿明的提醒”反映了发达国家的“五大垄断”可能会构成中国无法长期运用后发优势的外因。除此之外,后发优势发挥作用还需要内部条件的支持,而部分后发国家的政治混乱、民族矛盾甚至战乱往往是后发优势难以起到应有作用的内因,其与外因构成了后发优势的双重局限。一旦追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当前的内因其实多是源自历史上的负面遗产。例如在南美洲形成的大地主经济以及与这一经济基础相配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种制度体系使得人民遭受到了封建地主经济和具有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商业的“双重的剥削、变本加厉的腐败和更加明目张胆的不公正”^{[14]144}。西方前宗主国甚至会在新兴民族国家独立时故意通过领土划界、权力安排和资源分配等方式人为制造后发国家之间和国内各族群之间的矛盾,正如亚洲的印巴两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于是,与现实中不利于后发国家的外在国际环境一样,负面的历史遗产也限制着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的正常发挥,从而内在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

三、传统优势如何升级为竞争优势:一般原理与新型举国体制

萨缪尔森使用李嘉图—穆勒模型说明了中国在美国原本占据优势的产业上的技术进步会令美国在生产率上的优势消失,从而使得原本相互交易的两类商品的相对生产率相等,则此时分工和交易停止。实际上,穆勒本人对此也早有认识,他在1829—1830年间就写道:“如果该国在A、B商品的生产上既没有优势也没有劣势,与别国完全相同,那么也就不存在两国间商品交换的空间”^{[15]2}。我们可以批评穆勒忽视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内生性,但萨缪尔森恰恰证明了技术进步(这一变量在萨缪尔森的模型中仍然是外生变量)的经济结果不见得是分工和贸易的扩展(虽然这提高了全球整体的生产潜能),也可

能会反而走向“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不仅会阻碍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发挥,而且会使得另一项传统优势——后发优势的作用也受到限制。“萨缪尔森的忧虑”和“阿明的提醒”在模型中都暗示或者说隐含地假设: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这可视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交易时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中国后发优势的体现。所以,从影响后发国家的长期增长尤其是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纯经济视角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五大垄断”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必然是其对技术创新的垄断。西方国家在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及有意识地限制技术外溢正在成为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时的明显阻碍。换句话说,经济学理论上的后发优势以发达国家不采取对后发国家的遏制政策为前提,但此前提在现实中不成立。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后发大国必须超越传统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通过创造一种新的优势——国家竞争优势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自波特,他提出:“新的竞争优势理论必须从比较优势的观念提升到‘国家’竞争优势层面”^{[16]17}。实际上,国家层面的产业竞争优势是一个广延的概念,甚至也包括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关注的由于各国要素稀缺性差异所形成的特定产品的分工优势——例如后发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无论是劳动力成本(来自比较优势)还是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和引进获得国际通用的非核心技术(来自后发优势),都属于“低层次竞争优势”。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及其所塑造的产品品质差异则属于“高层次的竞争优势”^{[16]46}。于是,所谓的竞争优势,“最重要的行动是‘创新’”^{[16]42}。此处的创新要从熊彼特所定义的广义的视角来理解^[17],但对于中国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中国之前的赶超式经济增长已经基本耗尽了技术模仿的潜力的情况下。

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不考虑技术进步,或者如萨缪尔森和阿明的模型一样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后发优势理论可以内生地解释后发国家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来自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的模仿。竞争优势理论也将技术进步在模型中内生,但是其所理解的技术进步主要不是通过利用后发优势进行模仿所获,而是来自在良好的国家制度环境下所涌现的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

对于中国来说,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正在按照“萨缪尔森的忧虑”的隐性政策含义,因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抗性博弈策略而消失。因此,中国必须培育起以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标志的新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支撑高质量发展,进而最终实现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如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党和政府作为领导经济工作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理论上的一般原理需要遵循,也有近代经济史上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值得借鉴,更有中国本土的宝贵经验亟待加以理论总结。

在全球化竞争的开放型经济下,竞争优势最终要落实到企业生产力提高,因此企业是承载一国竞争优势的主体,而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首要是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提供良性的制度环境。即是说,从后发国家取得新的竞争优势的内部必要条件来看,除了企业家精神,政府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企业家精神在何种程度和方向上发挥作用实际上也取决于政府所塑造的国家制度环境能够提供的激励。对于企业能否形成以关键核心技术为基础的高层次竞争优势来说,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和制度重要。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提升本国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商业运行更有效率等,则它就选择了繁荣。与此相反,如果一国允许破坏生产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技能培训仅为少数人服务,或者仅靠家庭背景或者政府的妥协才能成功,则该国就限制了本国的财富积累,即选择了贫穷^[16]。即是说,只有当政府伸出的是“扶助之手”,企业才会积极而富有成效地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于是,如果承认有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之于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则如何形成竞争优势的问题转化为了政府要不要实施和如何实施广义的产业结构的争论。产业政策在类型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对自己选中的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加以扶助,从而有政府直接挑选获胜者的效果,可称之为“指令性产业政策”;二是激励所有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创新展开竞争的政策,政府提供普惠的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扶助而让市场决定获胜者,可称之为“竞争性产业政策”。所谓的竞争性产业政策,“其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首先要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完善的环境”^{[18]267}。这与“指令性产业政策”有很大的区别,“指令”代表了“由政府判断应该要推动哪些产业”,实际上就是政府来挑选赢家;“而竞争政策则是让市场决定哪些产业能够脱颖而出”^{[18]267}。

在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关于产业结构的争论中,“指令性产业政策”受到了普遍的批评,而“竞争性产业政策”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包括竞争优势概念的提出者波特也支持后者,认为“政府能做的是打造或影响企业周边的机制结构,以及从旁提供企业所需的资源。除非是处于竞争发展的初期阶段,否则一个成功的政府政策应是创造企业能从其中获得竞争优势的环境,而非直接介入竞争过程”^{[19]134}。

之所以多数经济学家反对“指令性产业政策”,是因为这类政策如欲成功,就必须满足一系列关于政府性质及其能力的隐含假设:政府比企业掌握着更多更准确的关于技术创新方向和方法的信息;政府有充分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国家能力来推动技术创新;政府能够不受寻租和设租动机的影响,安排最合适的企业从事特定的技术创新任务,而不会被反向俘虏。简言之,政府必须全知全能全善。这类假设是“指令性产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假设”^[20],但恰恰是它们很难做到与事实相符,而这种假设与现实的不一致性直接将整个模型建立在了沙滩之上。实际上,就连曾经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过以政府主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谋求国家竞争优势的克鲁格曼也承认,这种政策在实践中极难落地,因为政府会遭遇识别(什么是战略性产业)、实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寻租(如何避免利益集团的干扰)等困难^[21]。

反过来看,竞争性产业政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测试竞争优势的舞台。只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市场竞争又是全球化的,则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及其所从事的产业一定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从而可以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由于比较优势(因为资源枯竭、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等原因)和后发优势(因为越是接近全球技术前沿就越是潜力有限,且更容易遭到发达国家的遏制)在长期不可持续,开放经济下后发国家的企业(如“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长期来看也只能依靠技术创新。所以,“阿明的提醒”实际点明了在中国已经迈上较高的工业化台阶之后,中国企业必将面对发达国家的“五大垄断”的限制,而突破这些限制必须依靠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高端的竞争优势”。在这一优势转型的过程中,按照波特的思路,竞争性产业政策理论的政策含义之一是政府必须致力于为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提供制度环境上的支持。

但是,仅通过竞争性产业政策建构出符合西方标准的良好制度环境,就意味着达成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充分必要条件了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竞争性产业政策重要,这符合经济理论的一般逻辑和历史的普遍经验,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滑向政策上的反向极端。对于当今的中国,极为紧迫的情况是作为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新兴的后发大国,“萨缪尔森的忧虑”“阿明的提醒”和“修昔底德陷阱”都证明,中美之间的博弈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贸易和核心技术等领域的限制将是长期的。“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22]271}。所以,中国在这些关键性的基础科技领域必须放弃继续仰仗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幻想,独立自主地实现从0-1的技术创新。由于开展原创性基础科技研发的高固定成本、参与研发的高技术门槛以及研发结果的不确定性,此类研发无论在古今中外都基本不曾由私人企业为主承担甚至独立负责,故无法仅通过完善“竞争性产业政策”而实现

激励效果的最大化。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1]35}。对中国化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强调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上主张“竞争性产业政策”绝不等同于全盘否定“指令性产业政策”,真实世界的逻辑甚或与之相反。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结合中国化的政策实践可知,政府可以借由三种方式来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竞争优势,而民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又代表了国家竞争优势。以充分的国家能力为基础,这三种方式分别是典型的“竞争性产业政策”,典型的“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兼具二者特征的“混合性产业政策”。

其一,政府运用竞争性产业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知识产权类的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建构和执行而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需要由政府作为有充分法治能力的第三方来保证专利保护法和相关市场合同的执行,以帮助创新者实现合理合法的短期超额市场利润。于是,政府的法治能力或者说维护市场有效健康运转的能力降低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从事此类活动提供了一种属于典型的“竞争性产业政策”的激励。

其二,政府优化指令性产业政策,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直接推动基础科技的创新,而此类基础创新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当前,中国亟待实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产业升级,而阻挠中国的产业升级却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核心目的。在此种全球化新形势下,政府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的直接方式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392}。显然,政府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二种方式有典型的“指令性产业政策”的特征——由政府来选择产业发展方向并向其集中投入资源。

其三,政府可以在实践中混合运用竞争性产业政策和指令性产业政策,通过互补所形成的合力来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政府支持创新的很多政策都具有混合性质。例如,如果财政补贴对于所有尝试进行创新的企业来说具有普惠性,则其属于“竞争性产业政策”;反之,如果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有倾向性的,则相当于政府以补贴的方式来挑选赢家(类似于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做法),此时就具有了“指令性产业政策”的特征。因此,政府对于企业创新的财政补贴可以视为“混合性产业政策”。在中国化的新型举国体制下,“竞争性产业政策”与“指令性产业政策”是互补的,且这种互补性远不限于财政补贴的方式。更多时候,“混合性产业政策”反映了竞争和指令之间的相互配合:一方面,在一些核心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域,基于竞争性产业政策,多元研发主体以市场化方式展开的竞争可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实施指令性产业政策乃至沿用一些在传统举国体制下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例如组织不同单位的联合攻关),或有助于实现多元研发主体之间的协调(例如知识共享和合理定价),从而避免技术创新中的低效率过度竞争。

对于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环境下谋求产业升级的中国来说,真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和如何实施。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将不仅通过竞争性产业政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市场化激励,还可通过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混合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创造性破坏提供技术创新方面的直接支持。于是,政府正是通过综合运用“竞争性产业政策”“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杂糅了二者特征的“混合性产业政策”,最大化地促进了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崛起已经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且中国对国际分工格局的进一步影响在未来是明显可期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会在与中国的博弈中采取对抗性策略,其经济上的逻辑体现为“萨缪尔森的忧虑”。实际上,竞争优势可以在

国家间差异化发展,故各国都有机会在各自擅长的高端产业领域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所以,世界市场能够同时装下中美两个大国,但是主张对抗的零和博弈思维却成为了“逆全球化”的理论支撑。“逆全球化”破坏了后发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贸易是自由开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前提往往被视作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但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下,这一前提显然已不再成立。于是,后发国家的传统优势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经济现代化来说已无法继续仰仗,培育以科技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已然刻不容缓。

然而,竞争优势培育的经典思路——强调通过政府的竞争性产业政策来提高制度质量以获得竞争优势是不充分的。在培育国家竞争优势方面,新的优势可能来源于多种类型的产业政策的合力。于是,真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政府应该选择何种产业政策和如何运用产业政策。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存在思想误区:其认为竞争性政策是唯一可增进企业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故政府只能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且制度环境的评判标准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实际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竞争性产业政策”“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混合性产业政策”的政策组合才是既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又能最大限度地彰显中国的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的战略选择。

按照这一政策制定思路,从降低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直接成本的视角来说,优化指令性产业政策和混合性产业政策中的指令成分或许恰可有效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对于正在面临“卡脖子”(所以政府可以看得准)的基础性科技研究领域(外溢性巨大,但是投资规模很大且回报周期极长,故私人企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承担),政府可以有较为准确的关于产业优先发展方向的判断。这类新型指令性产业政策虽然在短期挑选了赢家,却在长期对所有欲参与国际竞争的民族企业普遍有利,从而具有动态的技术外溢普惠性,进而可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即使是在标榜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计算机、互联网、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也都是由政府直接组织和投资的,同样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性。

中国当然还需要进一步重视竞争性产业政策和混合性产业政策中的竞争成分,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在激励企业创新中的作用。但是,激励企业自主创新需要重视却不能迷信市场竞争,因为其可能导向短期利益最大化。二战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单纯依赖于企业家在市场价格机制下对利润的自由追求,结果是工业体系残缺甚至过早地去工业化(因为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符合这类国家的比较优势,而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又不足以支撑后发优势),陷入了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低端而无法自拔,更遑论形成竞争优势。于是,只有综合运用合理的政策组合——全面而完善的竞争性产业政策、适度而有效的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作为二者有机结合体的混合性产业政策,方可推动后发大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同时,通过产业政策来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改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与后发国家进行博弈时占据优势,凭借的是它们所拥有的资源、技术和规则等方面的垄断力量。当前,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有利于后者的变化,后发国家可以独立开展技术研发、控制重要的自然资源,自主签订经贸和政治合作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后发国家有能力推动国际经贸体系的改革乃至全方位的国际制度变迁,为自身竞争优势的培育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亟待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积极推动者。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J].求是,2023(4):4-9.

[3]SAMUELSON P.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8(3): 135-146.

[4]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7]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2]GOMORY,R,BAUMOL W. Globalization: Country and company interests in conflict[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9, 31(4): 540-555.

[13]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4]查尔斯·K. 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5]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6]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8]吴敬琏,八田达夫,陈清泰.反思产业政策[J].比较,2016(6):260-279.

[19]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0]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1]顾昕.重建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J].比较,2016(6):220-236.

[22]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收稿日期:2023—04—12 责任编辑:张 鹏)

Comparative Advantage, Latecomer Advanta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uo Ying, Wang Yi-li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growth as the world's top manufacturing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atecomer advantage, can no longer support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atecomer advantage, but also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Samuelson's worry",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brought by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harm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latter has an incentive to adopt a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the former. Therefore, the fu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depends on a new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especially the dynamism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key technologies. To this end, China needs a comprehensive a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olicy", a moderate and effective "directive industrial policy", and a "mixed industrial policy" that reflect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avoid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Amin's Reminder" and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e comple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icardo-Muller Model; Center-peripheral Model; Industrial Policy; New Type of State System